

第一章 少时即识愁滋味

家 世

1871年6月12日，在上海一条偏僻的弄堂里，随着一阵清脆的啼哭声，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

“是个男孩！”接生婆喜滋滋地把孩子裹好，小心放到了母亲的身边。这时，一直忐忑不安候在门外的男主人，闻讯急忙步入屋内，望着襁褓中的婴儿，已是热泪盈眶。这个刚刚出生的男孩，就是后来的著名外交家陆征祥。

陆征祥出身的家庭，并非名门望族，也不是世居沪上的人家。和众多上海的人一样，他是移民的后裔。

大概是由于处在社会底层的缘故，陆氏家族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家族史资料，后人无从知晓其移民上海的详细情况。不过，从现有的少得可怜的一些资料看，陆氏家族的移民史，和上海城市的崛起一样年轻，到陆征祥出生时，也只是第二代人。

《申报》，1920年11月1日。

陆征祥的父亲陆云峰，名诚安，原籍江苏太仓，^①生于 1835 年（清道光十五年）。和大多数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他的命运因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灾难而发生了变化。

19 世纪上半叶，大概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鸦片战争给生活于古老中华帝国的人们所带来的影响了。1840 年，醉心于鸦片贸易的英国殖民者，丧心病狂地挑起了侵华战争。在此以前，中国是东方的庞然大物，但英国兵轮鼓浪而来，由沿海入长江，结果是“秋风戒寒和议成，庙谟柔远思休兵，华夷抗礼静海寺，俨然白犬丹鸡盟”随后“夷人中流鼓掌去，三月长江断行旅”。^②弓箭刀矛抵不过枪炮，已腐朽没落的中国清王朝输掉了这场战争，被迫于 1842 年 8 月签订了割地开埠、赔款的《中英南京条约》。随之，法、美等西方殖民侵略者纷纷竞相援引“利益均沾”的条款，攫取了许多在华特权。从此，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走上了一条沉沦的道路。对于中国来说，鸦片战争成了近代历史的界碑。

当鸦片战争发生的时候，陆云峰才五、六岁，一时还不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冲击。但是，随着上海的开埠和大批传教士的东来，陆云峰的生活开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上海在 1843 年正式被辟为商埠之前，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但它地处富庶的太湖平原，背倚滔滔的长江大河，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居于南北通衢的要冲之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被独具慧眼的英国殖民者看中，由此上海成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强行被辟为商埠的城市之一。在开埠以后的短短几年里，背负着耻辱印记的上海，很快成了西方传教士、商人、外

上海档案馆编译：《颜惠庆日记》第三卷，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16 页。

张应昌编：《清诗铎》，第 420 页。

交官、各种冒险家云集的地方。在第一批随殖民者来到上海的西方人士中，有不少传教士，他们凭借着传教的特权，期望使上海的民众都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

但是，西方传教士在上海的传教活动，由于言语不通，最初并不成功。为了打开局面，传教士们开始雇佣中国人，为传教活动服务。那时候，战争、动乱、饥饿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影子和写照。对为饥饿和贫困所困扰着的中国下层民众来说，传教士的招募无疑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机会。这样，一些中国民众因生存的需要而入教成了信徒，又因入教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陆云峰就是较早的信徒之一。

陆云峰因迫于生计入教，成了伦敦外方传教会的一名信徒，靠为西方传教士散发圣经等传教品为生，成为那个时代众多“吃教”的人群中的一员。但他对宗教的信仰却是真诚的，一生都在为传教事业而奔波。即使到了晚年，身体欠佳，他仍不顾陆征祥的劝阻，北上天津、北京一带传教。他的这种为宗教献身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陆征祥对待宗教的态度。后来，陆征祥在修道院了却余生，与父亲殊途同归。

虽处社会底层，陆云峰也有不平凡之处，他“秉卓特之资，具微远之识，独醒于前清末造众醉之世，颠踬困顿，尤为常人所难堪，先生奋志独立，不自少挫”，^①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仁慈善良的品质。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慷慨大方，遇亲友有困难和急事，“至罄囊中糴粥资，以周助之，虽己枵腹，弗计”。陆云峰虽识字不多，在他身上却不时闪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芒，他总是喜欢谈论先贤哲人嘉言懿行，并时时用来教导陆征祥。陆征祥的血管里融进了陆云峰乐善好施的血液，他后来曾说：“我秉承了先父的

罗光：《陆征祥传》，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7 年版，第 12 页。

精神，平生常好分赠有益读物，从不以所费金钱为徒掷。”受父亲的影响和教诲，陆征祥在走上政治舞台后，从未因身居高位贪财受贿而受人指责和留下骂名。在北洋军阀统治末期，受政局变化影响，北洋政府停止给各驻外使节寄汇经费。时任瑞士公使的陆征祥连续 18 个月没收到薪俸，使馆所需一切费用开支无着。见此情形，陆征祥慷慨解囊，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垫支用尽，累计达 3 万余元^①；后来这笔钱政府一直没有归还。陆征祥夫人培德去世后，他只好变卖全部家产来筹集安葬费。陆云峰的遗风于此可见一斑。

陆云峰为人正直，有古君子风骨，在人生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解。1892 年，陆征祥被总理衙门选调，到驻俄公使馆充任翻译官，临行前，陆征祥以陆云峰年事已高，劝他不要再“自事生计”，由自己寄钱奉养，但陆云峰断然拒绝了。他说：“人贵能自立耳！我一日能自食其力，决不受领以自怠自弃也。今予精力尚足自养，汝勉旃，毋以父为念。”^②

在婚姻问题上，陆云峰也有着独特的婚恋观。因家境贫寒，陆云峰直到近 20 岁，才与吴金灵成婚。但他走的并不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共同拥有过的婚恋之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深信开启婚姻的钥匙应该由自己来掌握。他娶妻成家，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后来不幸中年丧妻，他也一直独身，未再续娶。陆征祥在近 30 岁时，娶一位西方女子为妻，陆云峰也并未进行干预。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儿子这样做，必有合适的理由。陆征祥在妻子去世后，也和他父亲一样，矢志未娶。

罗光：《访问陆征祥神父日记——六十述往之一章》台湾《传记文学》第 19 卷第 4 期，第 83 页。

② 罗光：《陆征祥传》第 12 页。

陆云峰的影响潜移默化，在陆征祥的人生经历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1912年当陆征祥回国就任外交总长后，请陆润庠为父亲的画像题字：

道貌严凝中外咸仰，
家风宣振先后同符。

丧 母

一个人人生的起点是童年。当陆征祥的同龄人用金黄色的丝带编织未来的梦想，享受父母给予的无限关爱的时候，陆征祥却不得不整天厮守在母亲的病榻边，与卧床不起的母亲相伴相随，在苦涩和沉闷中度过了人生的最初时光。

陆征祥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陆云峰和吴金灵成婚后不久，曾生育了一个女婴，可是，不过数周，陆征祥的这个姐姐就不幸得病夭折了。陆征祥的父母经受了一次不小的打击。

虽说这以后 16年中，没有了孩子的缠扰，日子仍过得紧巴巴的，但缺少子女的时光总让陆云峰夫妇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于是，陆云峰夫妇就用更加虔诚的态度对待耶稣基督，在每天的祈祷中企盼上帝能赐给他们一个孩子。陆征祥的出生，着实让陆云峰夫妇高兴了一阵。然而，不幸总是与陆云峰夫妇相伴而行。陆征祥的母亲因生产得了水肿病。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孩子，一边是身患重病的妻子，陆云峰全家陷入了困境。

由于母亲得病，不能起床行走，家中又无钱雇保姆喂养照料，出生时身体本来就瘦小的陆征祥，仅靠母亲日渐稀少的奶水供养，变得更加瘦弱了。童年的营养不良，给陆征祥身体上造成的缺陷，

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日后他出任驻荷兰公使，就不得不每年抽一个月到瑞士疗养看医生。在北京任外交总长时，民国的几任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均曾嘱咐各部部长和属下：“不要多找陆部长，不要去麻烦他，让他安心办外交，因他精力有限。”^① 民国第一任外交部次长颜惠庆也认为：“陆氏……颇著声誉，惟身体过于孱弱，难望担负艰巨。”^②

父亲早出晚归，母亲终日痛苦呻吟，在成长的岁月里陆征祥所耳闻目睹的就是这些。和一般的孩子相比，在童年的美好时光中，陆征祥几乎没有与小朋友一块捉迷藏、玩游戏的经历。他惟一的爱好就是终日摆弄父亲传教用的彩色小图片，日子久了，不但对图片中描述的人和事产生了兴趣，还会自己动手仿制，当作玩具玩。在母亲的病榻边，生活过早地教会了他善解人意，他处处小心生怕给病中的母亲和终日忙碌的父亲增添麻烦。在这种沉闷的生活环境中，陆征祥学会了沉默，变得心情压抑，他胆小谨慎，不爱吵闹。

1879年陆征祥8岁。他的母亲已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最后竟撒手人寰，她只活了37岁。母亲的早逝，对陆征祥是个沉重的打击。许多年后，当他撰写回忆录时，仍充满伤感地写道：“迄今，我仍以先母的早亡，心痛莫解。我忍负这种心痛，祝天下有母人，能长享母爱，使我与他们同乐，而略解我失母之痛。”^③

母亲去世后，陆征祥与父亲相依为命。当父亲每日很早外出后，陆征祥就一个人温顺地呆在家里，从不外跑，直到晚上父亲归来。在步入人生的最初旅途中，失去母亲后的孤独感长久地萦

罗光：《访问陆征祥神父日记——六十述往之一章》，《传记文学》第19卷第4期，第81页。

颜惠庆：《颜惠庆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页。

陆征祥：《回忆与思考》，转引自罗光《陆征祥传》，第10页。

绕在陆征祥的心头。

首先，陆征祥童年的不幸经历使他养成了循规蹈矩、柔弱温顺的性格特征。他从不争强好胜、指手画脚，也不爱冒险滋事生非。他沉默文静，一切都听天由命。

长久的室内生活和痛苦的经历也培植了陆征祥谦虚谨慎、忍辱负重、处事精细的精神。他总是不愿意承认：“这是自己努力的结果”。相反，他把每一次的成功和成就都归功于别人或其他的什么原因。他从不指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也不奢望自己的身体和智力会有什么大的发展。作为贫寒人家的孩子，他深知吃苦耐劳是自己的本色，养成了事必躬亲、勤劳任事的品德。

和以传教维持生计的父亲相依为命，还培养了陆征祥奇特的宗教观。陆征祥自小就被父亲引入教堂接受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加之受父亲的影响，上帝的观念在他心灵里深深扎下了根。晚年，他不顾亲朋好友的劝阻，超凡脱俗，毅然以年老体衰之躯投身修道院，与他童年时培植起来的宗教观不无关系。

陆征祥在少年时代形成的这些性格特征，在他日后的政治生涯中发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陆征祥遇事躬亲，精细谨慎，能坚决贯彻上峰的意图，不爱独出心裁，节外生枝，这些特点帮助他确立了在中国外交界的地位，使他先后两次出任国务总理、九次出任外交总长的职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成了一位显赫的人物；另一方面，也使得陆征祥忠厚老实，与人为善，淡泊名利，不爱斤斤计较，而且能忍辱负重，一些野心家就认为他温顺可驭，乘机利用他，导致在仕途上，陆征祥数度成为别人利用的工具，而自己每每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他的名字也往往与中国近代史上一些臭名昭著的卖国屈辱条约连在一起，成为人们指摘和攻击的对象。

求 学

在陆征祥成长的年代，正是上海急剧发生变化的时代，此时，欧风美雨强烈冲刷着中西文化交接要冲的上海。

受西方文明的冲击和刺激，上海的社会风气也悄悄发生了变化。部分上海人不再把西方的先进文明成果和引起的社会变化，视为洪水猛兽和邪恶势力，而是积极地去适应这个正在变化的世界。陆征祥的父亲陆云峰就是其中的一位。当陆征祥已到了该受启蒙教育的年龄，陆云峰却迟迟未把他送去读书。陆云峰对清王朝政治黑暗、官场腐败、道德沦丧、精神颓靡极为不满，在与外国传教士的频繁接触中，对西学渐有了解，加之受上海所发生变化的影响，使他对儿子的教育，抱着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教育观。那时候，读书人的惟一“正道”是走科举的道路，考秀才、中举人、会进士、点状元；然后做官当老爷，发财致富，光宗耀祖。但陆云峰却不愿陆征祥习四书五经，作八股文，走科举仕途之路。他只希望陆征祥学些有用的知识，作为谋生的手段。后来，陆征祥在给友人的信中对此是这样描述的：“祥年八岁，先母见背，父子二人，不知所归，影形相对，寂寞异常。一日，先父告曰：‘汝年八岁，尚无官名，今日当为汝取名。我闻苏州有一新翰林，姓名陆润庠，故我名汝为陆征祥，非望汝为翰林，但望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耳。’”^①

不知不觉中，陆征祥已 11 岁了。于是陆云峰打算让陆征祥进上海官府所办的新式学校——广方言馆受教育。可是，进广方言

《陆征祥致刘符诫书信选》，《文史资料选辑》第 33 辑 北京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6 页。

馆起码要会读书识字。迫不得已，陆云峰只好把陆征祥送进了一所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私塾的先生安排陆征祥与 6 岁的孩子一道读书。

由于营养不良，陆征祥骨瘦如柴，胆小羞怯，看起来与 6 岁的孩子并无多大区别。不过，少时的陆征祥虽说受教育晚，可天资聪慧，一入私塾就显示出过人之处，再加上学习上又很用功，在私塾仅仅读了两年，就将四书全部背熟了。

1883 年夏，13 岁的陆征祥又被父亲领着去报考广方言馆。那时的广方言馆，招生采取保送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万国公报》曾记此事：“学生必择端谨聪颖子弟，年在十四以下者充其选，又必官绅保之 观察试之。”^① 广方言馆负责招生的两位正副主考官将陆征祥唤入面试，询问其受教育的状况。当陆征祥回答说仅读过两年私塾，正主考官对他已不感兴趣。倒是副主考官见陆征祥身体瘦弱，满脸忧愧神色，不免顿生怜意。就对陆征祥说：“伸手给我看看。”看过手后又仔细端详了陆征祥的相貌，又接着说：“相貌很聪明，你既然读了四书，背一篇《论语》给我听。”陆征祥在私塾的用功没有白费，他一口气背了一章。正主考官听陆征祥背得那么熟，不觉来了精神，就问陆征祥为何读书这么晚？陆征祥回答说是母亲生病的缘故。正主考官见陆征祥诚实，也有点喜欢他了，于是就说：“受启蒙晚不是你的过错 准你入馆读书。”陆征祥由此考入了广方言馆。那次一共考取了 16 名 陆征祥是最后一名。

广方言馆坐落在江南制造局的西北隅，时人记述其景：“馆在南门外制造局旁，重楼杰阁。门外种竹万余竿，浓荫夹道，幽雅

《万国公报》第 361 卷，光绪元年十月初九日（1875 年 11 月 6 日）。

宜人”。^①初创时 学习课程以外文、算学为主 兼习经史词章 ,1870 年以后又增加了力学、天文地理、勘探、冶炼、机器制造、行海理法等课程，由一般地培育外语人才的学校转变为培养科技人才的综合学校。由于陆云峰希望儿子日后能成为一名有稳定收入的邮政办事员，陆征祥选择了外语作为自己的学习方向。

入馆后，陆征祥专修法语，领陆征祥跨入法语大门的老师是璞琚 (Adolf Bottu) 先生。他是法国人“博通欧洲各大国之言语，而操之又至为纯熟”。他是一位优秀的法语教师，不仅对教学极为认真负责，而且把欧洲的自由主义观念也带进了课堂。他对学生非常友好，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子弟。宽松愉快的学习环境，爱生如子的良师益友，使陆征祥度过了在方言馆内最初的二年时光。虽然璞琚先生只教了二年，但给陆征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年写回忆录时陆征祥对这位璞琚先生仍评价很高。

陆征祥很快显示出他在语言方面的天赋。由于他天性不爱活动，有着比别的孩子更多的时间用在书本上，再加上他聪明，记忆力很强，他的法语成绩在同学中很快就出类拔萃了。

当时，广方言馆为提高入馆学生的中文水平，还开设有不少中文课程。陆征祥一样用功勤学，从不偷懒。他后来的一言一行，受到这时他所读之中文书的影响不小。《四书》仍是他最喜欢的读本，后来他将自己的居室称为“慎独斋”，就是从《中庸》中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其所不睹，恐惧其所不闻。莫见乎隐 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而来。1919 年陆征祥参加巴黎和会路过拿波里时，意大利画家为他画像，他特地让画家在画像上用“慎独”一语，作为标识，可见他对《四书》是情有独钟。

葛元煦：《沪游杂记》第 1 卷，第 17 页。

经书、子书之外，陆征祥还喜欢阅读和琢磨与修身养性有关的书籍，诸如袁了凡的《四训》和张文端公的《聪训斋语》。在这两本书上都注有“广方言馆窗下读本”字样，陆征祥一直带在身边珍藏着。1948年即他去世前一年，他才将这两本书作为珍贵礼物送给了两次采访过他的罗光。这两本书是当日陆征祥读书生活的一面镜子，很能反映他的读书旨趣。在《四训》一书上，他在“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求其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内外双得，是有益于得也。若不返躬内省，而徒向外驰求，则求之有道矣，得之有命矣；内外双失，故无益”这段文字上用硃（朱）笔加了圈，说明他非常重视，且是反复研读之处，从中可见他慎独思想的深厚。自省自重，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陆征祥在《聪训斋语》的：“圃翁曰：‘圣贤领要之语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堤之束水，其溃甚易，一溃则不可复收也。微者，理义之心，如帷之映灯，若隐若现，见之难而晦之易也。……’，‘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等处也特加了标识。这里所引的点滴语句都隐然透露出陆征祥对个人品德修养问题的重视。他自省自重，严格操守，以圣人之言要求自己，后来他在官场多年，洁身自爱，从未染上官场贪贿敛财的恶习，这与他的读书生活大有关系。同时，晚年陆征祥特意把自己几十年的人生经验概括为“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奉赠友人，也可见当日读书生活对他的影响。他还梦想着自己将来能如圣贤先哲所说的那样：“思尽人子之责，报父祖之恩，致乡里之誉，贻后人之泽，唯有四事：一曰立品，二曰读书，三曰义身，四曰俭用”，按这样的标准实践自己的人生价值。

陆征祥对交友之道也十分着迷，他非常赞赏《聪训斋语》上所载的这样一段话：“与人相安，一言一事，皆须有益于人，便是

善人。……人能处心积虑，一言一动，皆思益人，而痛戒损人，则人望之若鸾凤，宝之如参苓，必为天地之所佑，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他视此为至理名言，为此，陆征祥把这一页的书角折起，并在上面特别标识了一“读”字。陆征祥不独这样铭记重视，以后更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陆征祥在方言馆中用心苦读的时候，一场大病几乎夺走他的生命。那是他 18 岁时发生的事。有一日，在馆中就读的陆征祥回到家中，晚上突然出现了病症，第二天早上就全身浮肿不能上学，和他母亲患得是同一种病，病魔缠身的陆征祥只好辍学在家。陆征祥的父亲为救治儿子，想方设法到处延医求药，总算把陆征祥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后来陆征祥曾感慨地说：“大家都以为我将不起了，但天主却救了我的命。”一年后，病愈的陆征祥又重新回到了方言馆，加倍努力补学病中所缺的功课，陆征祥没有想到，他在方言馆中的勤奋努力竟为自己带来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机会。

第二章 步入外交殿堂

入学北京同文馆

1890 年夏，陆征祥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广方言馆毕业。随即，他以位列第四名的身份与朱敬彝、陈貽范、杨书雯、刘式训、刘镜人、瞿青松等 7 人一起被方言馆保送京师同文馆深造。

北京京师同文馆是一座专为政府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的新式学校，它的创设是与中国外交失败的耻辱紧紧连在一起的。

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在对外交涉中是把西洋人当作夷狄看待的，不承认他们和中国有对等的地位。封建帝王一向以天子自居，所来往的国家，都是邻近的藩属，他们每年不过来行进贡的惯例，谈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的外交。等到鸦片战争，中国天朝大国的迷梦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后，方知道西洋人枪炮的厉害，在外交上不得不取退让的姿态。1858 年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据该约的第 50 条规定，以后英、法两国送至中国的外交文件，一概用本国文字书写，仅在 3 年以内可以附用汉文，清政府不仅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而且应西方侵略者的要求成立了专办外交事务的机构——总理各

国事务衙门。为了应付日渐艰难的外交局面，总理衙门奏请于 1862 年创设了同文馆，为政府培养翻译和外交人员。随后，地方督抚又奏请清廷同意，相继在最早被辟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广州两地设立了广方言馆、同文馆。后来，为了充实京师同文馆，总理衙门奏请从上海、广州两方言馆毕业生中择优调拨进京。

自上海广方言馆设立以来的 20 多年间，应总理衙门的要求，连陆征祥这批在内，方言馆选送优异毕业生入京师同文馆深造，也不过 4 次，入学同文馆的总共也只有 21 人。陆征祥赶上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到京师同文馆深造，意味着将来一辈子要与洋人打交道了。

8 月 正是盛夏时节 陆征祥告别父亲 随同其他 6 位同学一道踏上了进京的旅途。他们或步行、或乘船，一路风尘仆仆。到北京后，他们住在附设于总理衙门的同文馆内，等待着总理衙门大臣组织的考试。不负众望，陆征祥顺利过关，考入京师同文馆，开始了他在北京的学习生涯。

在同文馆里，陆征祥受教于法国人华必乐先生，继续攻读法文和法国文学。华必乐 (Vapereau Charles) 法国巴黎人，于 1870 年受聘到同文馆充任法文教习。由于教业突出，曾被总理衙门奏请清政府赏给四品虚衔。这位精通法国文学、历史，知识渊博的华必乐，把陆征祥引入了博大精深的知识殿堂，使他大开眼界，充分领略了法兰西文学的丰富多彩和世界文明史的辉煌灿烂。在受教期间，陆征祥也和华必乐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成为终身之交，直至 1925 年华必乐去世。由于有了这位被陆征祥奉为“明师”的华必乐的指导，陆征祥的法文有了长足的进步。

当然，中文仍是同文馆内必修的课目，对陆征祥来说，给他留下最深影响的是《礼记》。曾任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曾回忆说：

学校里面所研究的有一本包含三千条礼仪的书，学生学成以后，一切举措自然动定咸宜了。他不会感到困窘，一切行动自有一定的格式可以遵守，正和士兵上操一样。……

三千条礼仪中的第一条是：容貌态度应该严肃沉着；第二条是：举步要稳重端正。因此，同文馆的学生便不愿意习体育，认为有失尊严，他们只能慢慢地踱方步。^①

显然，同文馆选用《礼记》作为教材，一方面是借以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平，另一方面则旨在通过严格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儒家行为规范。这段经历使陆征祥受益匪浅。日后在外交界内，陆征祥的礼貌和庄重谦和的态度在中外都是出了名的。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陆征祥就被选为就职仪式的大礼官。陆征祥在北京为官时，曾留有许多笑话，其中一则是说他常在街头行走。“我在北京，常喜欢讲运动，时常在街上步行，手持手杖，一个人在街头巷尾里走。”当时北京的步军统领张朝宗常乘马车出巡，见此情景，十分诧异，曾问陆征祥：“陆总理为什么一个人在街上？”陆征祥回答挺风趣，他说：“去看看街上干净否。”其实，陆征祥街头散步的这一习惯，也是在同文馆读书时养成的。

和在广方言馆一样，在同文馆陆征祥仍是一位用功最勤、恪守纪律的好学生。除了学习之外，陆征祥偶尔还帮总理衙门翻译一些法文外交函件。

可是这个时期的陆征祥压根儿没想到学习法文会使自己的一生发生什么变化。当时，陆征祥对于自己的未来依然是遵循着父亲的嘱咐，他说：“我当日无心走外交的途径，因为做外交官的，

朱有熹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86—187 页。

于经史子集，都该通达。我所想望的，是能出国久居，日后回国，在邮局里谋一位置，因此我从未想做外交官。加之先君，深恶清廷官僚恶习，尤不愿我踏入宦途。^①他只想毕业后找个机会出国留学，学点谋生的本事回国，好在邮政、海关等需用外文、薪金又较高的地方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和老父亲。出于这一念头，陆征祥学习十分努力，法文成绩在同文馆内始终遥遥领先。他的父亲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1892年1月，陆征祥满22岁，已在同文馆就读一年。这时，一个改变他人生道路的机会到来了。

那时，清政府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回国休假期满。临行前呈请总理衙门选派同文馆学生到驻俄公使馆充为学员，担任翻译工作。于是，总理衙门按惯例挑选了成绩名列前茅的陆征祥，咨送许景澄，得到认可。对陆征祥来说，这次使命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拜 师 许 景 澄

1892年初，陆征祥被总理衙门选定派往驻俄使馆后，他从上海搭乘至法国马赛的法国邮船启程。那时，人们到俄罗斯，需要先搭乘轮船，经过海上的长途漂泊到欧洲，再经陆路转往俄国。轮船在海上航行少则需几个月，多则半年，因此出洋前往欧洲是需要有股勇气的。一路上，陆征祥无心领略海外的异国风情，欣赏大自然的千姿百态。对于海外生活一无所知的他，满腹忧虑，希望这是一次临时的使命，期盼着在不久的将来能被尽快内调回国。到法国马赛后，经过海上长途颠簸的陆征祥立即换乘火车，辗转

罗光：《陆征祥传》，第19页。

到了德国柏林，在这里，他与后来成为他恩师的许景澄会合，前往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开始了他新的生活。

许景澄，浙江嘉兴人，字竹笈，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与晚清时代那些愚昧自大，骂研习国际事务者为“汉奸”或斥之为“崇洋媚外”的守旧顽固士大夫们不同，他留心洋务，在晚清的官场中是一位较有见识和远大眼光的人。许景澄于光绪十年（1884年），被清政府派为出使法国大臣，这是他作为外交官生涯的开始。以后因母亲去世回国，守孝三年后，又于1890年再次被派往国外，充任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他对中国因缺乏懂外国语言、熟悉西方外交的人才而屡受外国蒙骗欺侮深有感触，深知外交人才培养之重要。所以，他时刻留意发现可造就之才。陆征祥到圣彼得堡后，很快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对这位操一口吴音的小同乡沉静稳健的性格，许景澄也颇为赏识，决意把他培养成一名优秀的外交人才。

一天傍晚，许景澄把陆征祥单独叫到了他房间，问：“你有何志愿？”陆征祥未加思索便脱口而出：“学好外文，找一邮局工作，供养父亲。”许景澄面露不悦，严肃地说：“国家培养你们，是希望你们能为国家做事，你怎能只想谋得一个小差事，供养父母？”陆征祥见状赶忙解释：“我父亲不愿我做官。我父亲非常痛恨为官。”听完解释，许景澄板着的面孔松弛了：“你父亲所痛恨的是贪官污吏。但圣贤所教导的，官是民之父母，要爱护人民，为公家做好事。我所要求你的，是这一类的官。”陆征祥沉思了一会，说：“大人的好意，我十分感激，但恐怕我不堪造就。”许景澄说：“不要紧，你是下材，我可以使你成为中材，你是中材，我可以使你成为上材。”

一向不愿违背父亲意愿的陆征祥，把与许景澄的这份奇缘写信告之了父亲，他父亲很快便回信说：“这是天赐良缘，你不但以